

May 2016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and the Study on Texts in the Ming Dynasty

Jianzhong Bai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Bai, Jianzhong. 2016.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and the Study on Texts in the Ming Dynast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6, (3): pp.171-177.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6/iss3/11>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文心雕龙》与明代的文章学

白建忠

摘要:《文心雕龙》学在明代兴起,有诸多因素使然,其中一个因素是明代六朝派的关注。《文心雕龙》作为中国古代一部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对明代的文章学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至于明代后期出现了第一部模仿《文心雕龙》的文章学专著《文通》。明代文章学中一些经典性的表述与重要的理论范畴,如文源于五经、文道、文心、文质、体制等,或者是对《文心雕龙》的继承,或者是在继承《文心雕龙》的基础上又有所拓展与衍伸,显示了明代学者既珍视前代的文章学遗产,又展现了他们开阔的学术视野、不苟同于前贤的学术追求以及在发展古代文章学中所做出的应有贡献。

关键词: 文心雕龙; 明代; 文章学

作者简介: 白建忠,文学博士,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电子邮箱: baijian-197612@163.com

Titl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and the Study on Texts in the Ming Dynasty

Abstract: The study of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emerged in the Ming Dynasty for many reasons, among which the Six-Dynasty School's attention to the work was an important factor. The influence of *Literary Mind* was so great in the Ming-Dynasty study on texts that the first monograph on text study *A General Survey of Literary Texts* (*Wen Tong*) was written in the style of *Literary Mind* in late Ming Dynasty. Some of the influential and important concepts in *Wen Tong* were either inherited from or developed upon *Literary Mind*, which showed that the Ming-Dynasty scholars could both inherit the legacy of literary text studies and develop their own academic field.

Keywords: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Ming Dynasty; study on literary text

Author: Bai Jianzhong, PhD,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nfen 041004, China), with main academic interest in Chinese ancient literary theory. Email: baijian-197612@163.com

中国文章学,自《文心雕龙》(以下简称《文心》)始,就已构建了较为严密的文章学理论体系。吴承学先生说:“《文心雕龙》体大思精,结构严密,为集大成之作,已经初步建构了中国文章学的理论系统”(吴承学 155)。从明代伊始,《文心》才逐渐引起了人们更为广泛的关注,或校勘,或笺注,或品评,或序跋,或征引等。概观所有的这些研究,可以发现,其中的文章学受到了《文心》很大影响。鉴于此,本文主要探讨《文心》与

明代文章学二者之间承继与衍变的关系,这对于研究《文心》本身的文章理论,以及发掘和认识明代文章学的某些理论范畴和审美观念有重要意义。^①王水照先生《历代文话序》将古代文章学的内涵与体系分为七大部分,分别是文道论、文气论、文境论、文体论、文术论、品评论、文运论。^②本文的写作思路与论述范围主要参照、借鉴了王先生的观点。

—

文道是中国古代文章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刘勰首次提出原道、征圣、宗经,影响深远。唐宋以来,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人的文、道关系论与《文心》之间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明代,在文道论方面,受《文心》影响较大者当属宋濂。宋濂对《文心》有过研究,他在其著述中不仅论及《文心》,而且在《诸子辩》中,指出《刘子》是刘勰所撰,并说:“今考勰所著《文心雕龙》,文体与此正类,其可征不疑”(宋濂,“宋学士”1006)。宋濂的文道论对《文心》既有接受又有超越,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在文的内涵与外延等方面,宋濂基本承接了刘勰的观点,但与刘勰相比,又有不同。首先,刘勰所谓的“文”有广义、狭义之别,广义之文是指天地间一切事物所体现的形状、颜色、花纹、声韵、节奏等,具体包括天文、地文、圣文与人文。宋濂笔下的“文”也有广、狭二义,其《讷斋集序》说:“凡天地间青与赤谓之文,以其两色相交,彪炳蔚耀,秩然而可睹也。故事之有伦有脊,错综而成章者,皆名之以文”(宋濂,“宋学士”201)。接着宋濂将文分为“邦之文”“庙之文”“官之文”“乐之文”“礼之文”“兵之文”“政之文”“刑之文”等。《曾助教文集序》说:“天地之间,万物有条理而弗紊者,莫非文”(宋濂,“宋学士”215)。宋濂认为天地间的万物凡是有条理者皆可称之文。以上所言乃广义之文,与刘勰在《原道》开篇中所阐述的广义之文基本是一致的。宋濂与刘勰所谓的狭义之文皆是指用文字写作的文章。

其次,宋濂《华川书舍记》曰:“日月照耀,风霆流行,云霞卷舒,变化不常者,天之文也;山岳列峙,江河流布,草木发越,神妙莫测者,地之文也;群圣人与天地参,以天地之文发为人文”(宋濂,“宋学士”37)。宋濂也将“文”分为天文、地文、群圣人之文与人文,宋濂对“文”作出如此划分,与刘勰一样,其目的之一是突出圣文的重要性,为宗经张本。宋濂又把人文分为众人之文、贤人之文与圣人之文,其《灵隐大师复公文集序》说:“众人之文不足论。贤人之文则措之一乡而准,措之一国而准,措之四海而准。圣人之文则斡天地之心,宰阴阳之权,掇五行之精,无鉅弗涵,无微

弗掇。[……]”(宋濂,“宋学士”222)。何谓众人、贤人、圣人呢?宋濂说:“有一人之文,有十人之文,有百人之文,有千万人之文,有亿兆人之文,其赋受有不齐,故其著见亦不一而足。所谓亿兆人之文,圣人是也;千万人之文,贤人是也;百十人之文,众人是也”(“宋学士”222)。众人是指禀赋一般的人,贤人是指禀赋很高的人,圣人是指禀赋最高的人。刘勰提出了圣文,如《征圣》:“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范文澜16)。③宋濂的“群圣人之文”或“圣人之文”与刘勰的“圣文”,其内涵是一致的。与宋濂相比,刘勰并未明确提出贤人之文与众人之文,所以,宋濂关于人文的划分更细致了,这是宋濂有别于刘勰之处。

再次,宋濂《赠梁建中序》还将文人分为上、中、下三级,下级文人是指“搜文而摘句”“日以学文为事”者,“去道益远”(宋濂,“宋学士”308),宋濂不屑于做一个纯粹以写作为能事的文章家,他也不喜欢别人称呼他为文人,其自传《白牛生传》曰:“生好著文,或以文人称之,则又赧然怒曰:‘吾文人乎哉!天地之理,欲穷之而未尽也;圣贤之道,欲凝之而未成也。吾文人乎哉!’”(宋濂,“宋学士”376)。中级文人是指“其近道者则而效之,其害教者辟而绝之”“无非以明道为务”(宋濂,“宋学士”308),上级文人是指“其文之明由其德之立,其德之立,宏深而正大,则其见于言自然光明而俊伟”(宋濂,“宋学士”308)。宋濂的理想是做一个阐明并践行圣道的思想家,或者做一个由中级进而升到上级的文人。与宋濂不同,刘勰对文人颇为重视,其《才略》篇对历代作家的才华、文采褒扬有加,如说司马相如“洞入夸艳”,陆贾“首发奇采”,刘桢“情高以会采”等。不过,从刘勰的人生抱负以及对“文”的态度来看,与宋濂也有相似之处,其《程器》说:“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他首先是要“达”,不得已时才屈居于“穷”,刘勰理想中的文人是文艺与政事“左右惟宜”,“摘文必在纬军国”(范文澜720),“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军国所以昭明”(范文澜726),宋濂《送从弟景清还潜溪序》曰:“达则为公为卿,使斯道行;不达则为师为友,使斯道明”(宋濂,“宋学士”267)。无论穷达,唯以行道、明道为己任。前者“纬军国”,后者“明道”,二人都比较看重文的实

用性与政治教化作用。

第二,“五经各备文之众法”。《文心·宗经》曰:“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讚,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刘勰将各种文体分别一一对应地归源于五经,宋濂《白云稿序》指出刘勰的论述“有未尽焉”,他说:“《易》之象象有韵者,即诗之属;《周颂》敷陈而不协音者,非近于书欤;《书》之禹贡顾命,即序纪之宗;《礼》之《檀弓》《乐记》,非论说之极精者欤;况《春秋》谨严,诸经之体又无所不兼之欤”(宋濂,“宋学士”226)。自南北朝刘勰、颜之推等人提出文章源出五经的观点之后,这种说法逐渐成为普遍的观念,而且执此看法者往往将古代文体沿波讨源、“强索而分配”于五经,宋濂与之不同,他主张“五经各备文之众法,非可以一事而指名也”(“宋学士”226)。从文体学角度看,宋濂的看法可以视作是对刘勰等人论述的新拓展。明代姚福《青溪暇笔》指出在刘勰与宋濂之间,还有陈骙《文则》曰:“《六经》之道,既曰同归,《六经》之文,容无异体。故《易》文似《诗》,《诗》文似《书》,《书》文似《礼》。《中孚·九二》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使入《诗·雅》,孰别文辞? [……]”(姚福703)。最后姚氏补充说:“刘氏之言,言其大凡耳。陈氏特指其一二相似者而言,宋氏则谓《五经》而可以备诸体。虽然,微刘氏不足以启陈氏,微陈氏则宋氏无由出此言也。后之论者,固不可以此而废彼焉”(姚福703)。姚氏认为三家之说皆不可废,而刘勰之说是导夫先路者。

既然“五经各备文之众法”,故宋濂与刘勰一样,也主张宗经。《浦阳人物记》卷下《文学篇》曰:“文学之事,自古及今,以之自任者众矣,然当以圣人之文为宗”(宋濂,“浦阳”17)。他们二人对待孔子的态度也是一致的,宋濂《七儒解》将孔子看作“千万世之所宗”,又说:“自有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者也,我所愿则学孔子也”(宋濂,“宋学士”1015),与刘勰在《序志》中所表达的“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的仰慕之情是一致的。

宋濂虽然主张宗经,但其所宗之文并非专指六经,他说:“六籍之外,当以孟子为宗,韩子次之,欧阳子又次之”(宋濂,“宋学士”933)。宋濂

《华川书舍记》评王子充曰:“上自群圣人之文,下逮诸子百家之文,咸萃舍中,日搜而精玩之,大肆其力于文,愈出而愈无穷”(宋濂,“宋学士”37)。刘基《宋景濂学士文集序》曰:“若经若史若子集,无不遍览”(宋濂,“宋学士”1618)。贝琼《翰苑集序》评宋濂曰:“公自五经子史,靡不通究”(宋濂,“宋学士”1624)。由此足见,宋濂对诸子等书并不排斥。刘勰也主张以五经为本,并汲取纬书、《离骚》、诸子等书的滋养。二人的论述理路很相近。

第三,宋濂还提出文道合一的观点,《徐教授文集序》说:“文者道之所寓也”“文外无道,道外无文”(宋濂,“宋学士”217)。宋濂“文与道非二致”的观点,近则受到了宋代理学家“文以载道”以及金华学风注重事功的影响,远则可以溯源至《文心》。刘勰《原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宋濂《文原》:“吾之所谓文者,天生之,地载之,圣人宣之”(宋濂,“宋学士”932),“圣人宣之”与“圣因文而明道”如出一辙。不过,宋濂作为明代的“开国文臣之首”,又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恩宠,这种身份与地位决定了他在处理文、道关系时,更多地带有官方色彩,表现出明显的重道轻文的一面。^④宋濂看重“文”的载道性,对于纠正元末文坛浮华之文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他过度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故不可避免地消解了文学的独特性。其《徐教授文集序》指出“扬沙走石,飘忽奔放者,非文也”,“情缘愤怒,辞专讥讪,怨尤勃兴,和顺不足者,非文也”,“庾辞隐语,杂以诙谐者,非文也”等等(宋濂,“宋学士”216)。宋濂将文看作“治具”,“明道之谓文,立教之谓文,可以辅俗化民之谓文”,“句读顺适”“训诂艰深”之文,在宋濂看来“亦技而已矣”(宋濂,“宋学士”937),这势必就将表现作家对自然、人生、情感、历史个性化体验和注重文采的文学创作,排斥在载道之“文”以外了,文学变成了卫道之具。这与以韩愈、欧阳修等人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既重道又不轻视文的主张不同,也与刘勰在宗经的前提下,并未忽略对文章艺术性的探讨不同。因此,与宋濂相比,刘勰的文学眼界要通达得多,刘勰虽然亦看重政治、事功,但在《文心雕龙》范围之内,他并没有轻视文学,如《谐隐》篇,在宋濂看来,不能算作文,其它如《声律》《章句》《丽辞》《练字》等,都是刘勰重视文选创作技巧与审

美性的重要体现。

综上所述,宋濂的文道论一方面对《文心》有所承继;但另一方面,宋濂并未一味墨守刘勰的观点,在某些看法上,他能有所突破。而且,由于宋濂与刘勰的身份、地位以及所处的时代、文化环境不同,他们文道论的内涵又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

二

有明一代,真正开启《文心》学的乃是杨慎。杨慎十分重视《文心》,他曾用五色批点《文心》。以下从三方面论述杨慎对《文心》文章学的继承与阐扬。

首先,杨慎同刘勰一样,也主张宗经。杨慎认为五经是后代诗文之源,是后人学习的楷式,其《云南乡试录序》云:“文必宗经,必法古,必崇雅,必黜浮”(杨慎,“杨升庵”34)。与刘勰不同的是,杨慎认为《易》又是“五经”之源,其文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其次,在文与质的关系方面,杨慎与刘勰的看法是一致的。刘勰主张以质为主,文质并重,《情采》云:“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杨慎批曰:“予尝戏云:‘美人未尝不粉黛,粉黛未必皆美人;奇才未尝不读书,读书未必皆奇才。’”(黄霖 109)。杨慎以“美人”与“奇才”为喻,说明文章要重视辞采,但应以情感为本。

杨慎十分重视《风骨》篇,与《文心》其它篇相比,所加评语与圈点较多。黄侃、范文澜等先生认为“风”即“文意”,“骨”即“文辞”,所以《风骨》篇所论仍然在文质范围之内。《风骨》篇所见杨慎评语有四则,其中有一则评语,尤值得赏味。《风骨》:“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杨慎批曰:“引‘文明以健’,尤切。明即风也,健即骨也。左氏论女色曰‘美而艳’。美犹骨也,艳犹风也。文章风骨兼全,如女色之美艳而两致矣”(黄霖 99)。杨慎从两个层面阐释了“风骨”二字的内涵:其一,“明即风也,健即骨也”,“明”是明朗之意,即刘勰所说的“深乎风者,述情必显”(范文澜,“风骨”513);“健”是刚健之意,即刘勰所说的“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范文澜 513)。钟惺亦评曰:“引‘文明以健’,妙甚。明即风也,健即骨也”(黄霖 101)。其二,“美犹骨也,艳犹风也”(黄霖

99)。据《春秋左传》卷四记载:“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杨伯峻 83)。何谓“艳”?杨慎《墨池琐录》卷二曰:“艳,长大也。《汉书》载昭君丰容靓饰,《唐史》载杨妃肌体丰艳”(杨慎,“杨升庵”7)。若以女色喻书画,杨慎认为“不丰则不艳”,因为“盖肉不丰,是一生色骷髅”;但“肉”不可过丰,“艳多无骨”,过丰则变成“肉鸭”。风骨之美即美艳两致,“丰肌而神气清秀者也”(杨慎,“杨升庵”7)。杨慎借用左氏形容女色的“美艳”来解释“风骨”,这在历代诠释“风骨”的含义中是颇具特色的。要之,杨慎对风骨二字的笺释,体现了杨慎本人独特的审美眼光。

最后,杨慎也主张文道合一。《六书索隐序》曰:“夫子之性道,不离乎文章,子贡未之合一耳”(杨慎,“杨升庵”101)。子贡将孔子的文章与性道分而言之,杨慎认为孔子所言性道与文章应该是合一的。杨慎重道,他认为孔子之道与天地并存于世,万代不变,即刘勰所说的“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范文澜 21)。此外,杨慎与刘勰一样,对“文”也颇为重视,其《论文》云:“论文或尚繁,或尚简,予曰:繁非也,简非也,不繁不简亦非也。或尚难,或尚易,予曰:难非也,易非也,不难不易亦非也。繁有美恶,简有美恶,难有美恶,易有美恶,惟求其美而已”(杨慎,“杨升庵”708)。杨慎认为评价一篇文章的好坏,不应从繁简难易的角度入手,“论文者当辨其美恶,而不当以繁简难易也”(杨慎,“杨升庵”708)。与宋濂等道学家相比,杨慎“惟求其美”的论文标准摆脱了道德说教的气息,为文学的独立发展提供了一个比较自由的空间。

总之,杨慎与刘勰二人论文皆能切中文坛时弊。刘勰强调宗经是为了纠正六朝浮靡之文风,杨慎重视宗经、重视风骨是为了反对明代中期虚而不实之空谈,杨慎《辞尚简要》批评当时科场应试之文,“冗赘至千有余言”,“篇篇相袭”,而且“师以此授徒,上以此取士”(杨慎,“杨升庵”709)。

明代中期的文章学,受《文心》影响较大的还有王文禄的《文脉》。《文脉》共三卷,分别为《文脉总论》、《文脉杂论》、《文脉新论》。其《杂论》在评论前代文章之代表作家时,特别拈出刘勰,他说:“三国、六朝得八人焉:曹植、祢衡、张协、陆机、刘峻、江淹、庾信、刘勰是也”(王文禄 1697)。

王文禄在《文脉》中提出的一系列文章观念,如文以载道、文由性生、世衰而后文盛等,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文心》的影响。不过,相比而言,王文禄的文心说更具特色。

王文禄对“文心”极为重视,其《总论》曰:“夫脉以贯道,道原于心”“观心不亡,则脉不亡;脉不亡,则文脉不亡”(王文禄 1690)。文脉能绵延不绝,是由于人心未亡,因此心在文章创作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他说:“为文须有文心始可与言文,盖识见高明,不染利欲。”又曰:“匪文难,文心难也。心或夹杂,本失矣,词华曷生哉?”(王文禄 1694)。为文须先培养文心,心存私欲,则本心失矣。刘勰《情采》云:“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真宰弗存”与王文禄“心或夹杂”的表述很相近。

王文禄的文心说近则受到了陆、王心学的影响,他说:“夫陆、杨二公尊德性者,务本也。盖人心汨利欲,滞见闻,非静养曷见性真?是以阳明倡良知、人心、一惺,有志者共明之可也”(王文禄 1707)。陆九渊、杨简的发明本心与王阳明的致良知,都强调人心在慕圣之学中的首要性。由王文禄的一些言论亦可断定,他当是陆、王心学的追随者,他说:“自一向宗朱子而斥陆子,阳明起而扶陆子”(王文禄 1696)。《四库全书总目》评王文禄曰:“其述理学则推象山、慈湖”(永瑢 1801)。

王文禄的文心说远则可上溯至《文心》,其《总论》曰:“杜子美曰:‘文章有神。’陈绎曾《文筌小谱》第一曰:‘澄神。夫神者,性之灵颖,无微不透,无古无今。惟澄神则神清不杂。’[……]刘勰《文心雕龙》赞曰:‘百龄影徂,千载心在。’文章心精也,神气钟焉,欲不垂世,得乎?”(王文禄 1694)。“千载心在”之“心”是指圣人之心,圣人的生命虽然逝去,但他们用心创作的作品永久垂世。要之,王文禄“文心”说的内涵主要是指“文为之用心”要摆脱杂念、不染利欲、精诚专一,刘勰《神思》云:“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淪五藏,澡雪精神”。二人皆强调酝酿文思贵在虚静,心怀霜雪。

综上所述,在明代,“前后七子”所倡导的复古文风盛行一时,他们恪守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等主张,势必决定了他们中的多数人对《文心》持

一种漠然的态度。《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瀛溪草堂稿》提要评李梦阳、何景明曰:“迨关西、信阳两君子出,追宗秦汉,薄魏晋而下”(永瑢 1502)。从作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文心》的序跋中,不难看出,由于明代文坛对六朝文学的贬抑,《文心》亦遭拒之于门外。如方元祯曰:“论者以六朝齐梁而下,佛学昌炽,为文多工纤巧骈骊,气亦衰靡,概以律繩,岂通论哉!”同样的评论亦见于张之象的《文心雕龙序》中,稍后的伍让更直接指出:“世未可以六朝语而易之也”。而杨慎独树一帜,自开户牖,他属于六朝、初唐派,清张松孙《文心雕龙序》高度评价了杨慎对《文心》所做出的贡献,他说:“杨升庵阐发精微,厥功伟矣。”^⑤王文禄对六朝文学亦甚为推崇,《四库全书总目》评王文禄曰:“论文体则推六朝、《文选》”(永瑢 1801)。晚明的朱荃宰,也崇尚六朝文学,其《文通》应该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模仿《文心》的文章学著作。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由于他们对六朝文学情有所钟,所以才把目光投向了《文心》。故明代《文心》学的兴起,与六朝派的关注有一定关系。《文心》是一部应时而生的著作,其挽救六朝浮靡文风的宗旨昭然若揭,杨慎、王文禄的文章观念同刘勰一样,他们的肩上同样担负着振救讹滥文风的责任。杨慎作为明代一大家,其应有的文化责任感自不必说,王文禄的名声虽然远逊于杨慎,但他也表现出了对当时文风的不满:“今之文也繁而虚,昧心也,伪也”(王文禄 1710),其关怀文坛现状的情感溢于言表。

三

明代后期,有几部资料汇编式的文章学著作,受《文心》的影响较大。其中一部是《言文》三卷,作者为谭浚。谭浚《言文序》曰:“言各一隅,末由会通”,“合而言之,文可见矣,故曰言文”(谭浚 2326)。这是谭氏撰辑《言文》的缘起,亦道出了该书的性质,它是一部博采折衷前人之说的著作,以示学文者之门径。

《言文》的文章学与《文心》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直接化用、征引《文心》之语。《言文序》首句:“文之为言也大矣哉”(谭浚 2324),刘勰《原道》首句:“文之为德也大矣”,遣词用语很相近。《充气》篇皆为采摭他人之说,以

刘勰为多,但将韩愈、元好问、李梦阳论气之语与刘勰《养气》之语并为一篇,失于芜杂,因为他们所论之“气”,其内涵并不一致。《言文》卷上其它篇如《备情》《体势》《声音》《删布》《夸饰》《变奇》《才思》《著述》等皆直接征引刘勰《情采》《声律》《铨裁》《夸饰》《体性》《定势》《事类》之语,所论与刘勰的观点基本一致,不乏公允之见,如“文质不偏胜,情词斯适宜”(谭浚 2330),“敷陈实义谓之布,剪裁浮词谓之删”(谭浚 2344),“夸贵有则,饰贵得宜。失宜乃诞,失则乃诬”(谭浚 2345),“用正以驭奇”,“勿逐奇而失正,勿从变而乱常”(谭浚 2345),“文之巨细系乎才,词之工拙由乎思”(谭浚 2348),“以才为主,以学为辅”(谭浚 2349)等。

第二,对《文心》的文章学既有继承,又有发展。首先,谭浚与刘勰一样,也主张宗经,其《言文序》曰:“言文者必宗乎道,言道者必宗乎圣”(谭浚 2324)。《原流》曰:“迄今之作,其原于经”(谭浚 2327)。不同的是,刘勰在谈到文章源出五经时,仅列举了二十种文体,谭浚在刘勰等人的基础上,将其扩充为一百多种文体,将古代的各种文体分配于五经,以简驭繁,但难免出现牵强附会之弊,如“美新”,本来是指杨雄的《剧秦美新》,属篇名,而谭浚将其列为文体名。早于谭浚的黄佐,其《六艺流别》更是将文章源出六经的观点发挥到了极致,黄氏将一百五十多种文体分别系于“诗”“书”“礼”“乐”“春秋”“易”之下。《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二说:“至刘勰作《文心雕龙》,始以各体分配诸经,指为源流所自,其说已涉于臆创,佐更推而衍之,剖析名目,殊无所据,固难免于附会牵合也”(永瑢 1746)。

其次,谭浚《文理》篇将“文”分为天之文、地之文与人之文,与刘勰《原道》篇的天文、地文、人文之说基本一致。《设喻》在引用刘勰《比兴》篇的基础上,对比喻又作了更细致的分类,有简喻、备喻、诂喻、贯喻、萃喻、泛喻、显喻等。刘勰《丽辞》将对偶分为言对、事对、反对、正对四种,而谭浚《偶词》分丽辞之体十二:正对、言对、顺对、类对、字对、骈对为劣,反对、事对、互对、假对、章对、句对为优。

如果说谭浚的《言文》多所融通的话,那么朱荃宰的《文通》则完全属于资料汇录式的著作。《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七评此书曰:“盖欲仿刘

勰《雕龙》而作”(永瑢 1803)。由于《文通》是模仿《文心》而作,故体制宏大,内容浩博,全书凡三十卷,然与《文心》相比,该书“大抵摭拾百家,矜示奥博,未能一一融贯也”(永瑢 1804)。

《文通》卷一至卷三总论经学、史学与诸子学等。卷四至卷十九为文体论。《文通》的文体论与《文心》以及明代其它文体学论著,如吴讷的《文章辨体》、徐师曾的《文体明辨》等相比,有两个显著的特征。第一,《文通》不收诗赋体,朱氏有意区别诗与文,他说:“文则经史子集”,“诗自三百、乐府、古、近”(朱荃宰 2609)。《文通》收古代散文文体一百八十多种。与《文通》一样,明清之际贺复徵的《文章辨体汇选》亦不收诗赋,有学者指出大概是受到了宋代以来诗文之辨的影响。第二,《文通》重视史学,其《自叙》说:“吁嗟,彦升不成权舆,《雕龙》来疥驼之讥,《流别》竭拮据之力,伯鲁广文恪之书,号称《明辨》,自述费年,而皆不本之经史”(朱荃宰 2606)。朱氏指出《文心》《文章流别》《文体明辨》等书未“本之经史”,《文通》卷三“渊源经史”引颜之推、王世贞等人之语说明文章源出经史,与刘勰、谭浚、黄佐等人的文章源出五经显然有别。故《文通》的文体分类中,有一些属于史学类文体,如本纪、世家、列传、补注、年表、人表、注、史赞等。《文心·史传》云:“故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辅政体,十表以谱年爵”。刘勰只是简略提及,而朱氏将本纪、列传等单独拈出,变成了几种独立的文体。除了《文通》,《文章辨体汇选》亦十分重视史书类的文章,这应该是对《文心》文体论的重要拓展。此外,《文通》的文体论大量征引《文心》,兹不赘举。卷二十至卷二十五为创作论、批评论,其中部分资料辑自《文心》,所用题目也与《文心》篇名一致。卷二十六至卷三十为杂论。最后一篇为《詮梦》,《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七曰:“末《詮梦》一篇,酷摹勰之自序”(永瑢 1803)。“勰之自序”指刘勰的《序志》篇。在《詮梦》中,朱氏阐述了《文通》的编撰目的,“质者文之母也”,“方今文之弊也,患在不能正本澄源,反文归质”,“予之述诸通也,所以救其弊而障其澜也”(朱荃宰 3101),刘勰《宗经》:“正末归本,不其懿欤!”《情采》:“《贲》象穷白,贵乎反本。”《序志》:“离本弥甚,将遂讹滥。”显然与刘勰创作《文心》的目的较一致。朱氏在《詮梦》篇末尾引刘勰“百龄影

祖,千载心在”(范文澜 17)之语,也表达了与刘勰相同的愿望,即“名踰金石之坚”(范文澜 725),通过立言使声名传之于后世。

由上述可知,无论是体系的建构,还是内容的编排,朱氏的《文通》皆着意模仿《文心》,但与体大思精的《文心》相比,朱氏的《文通》要稍逊一筹。不过,从汇辑、保存文献资料来看,《文通》尚有一定的价值。

综上所述,自杨慎之后,《文心》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迨至明代后期,出现诸多名家评点《文心》,如陶望龄、陈仁锡、曹学佺、钟惺等,一般来说,他们的评点对《文心》本身的文章学理论发明的并不多,但对于扩大与提高《文心》在文坛上的影响与地位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在这股《文心》学的影响下,明代后期开始出现模仿《文心》的作品。清代之后,模仿《文心》的文章学著作逐渐增多,如马荣祖的《文颂》、吴曾祺的《涵芬楼文谈》、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刘师培的《文说》等。

注释[Notes]

- ① 本文限于篇幅,仅考察明代文章学论著中直接论到《文心雕龙》者,其它受《文心雕龙》间接影响或与《文心雕龙》暗合相似之文章学,皆不作论述。
- ② 见王水照《历代文话》第1册第5页。
- ③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为省篇幅,以下凡引《文心雕龙》语,均用该版本,不另注。
- ④ 廖可斌《论宋濂前后期思想的变化及其它》指出,宋濂仕明前后的文学主张不同,仕明之前,他比较注重文学创作技巧的探讨;仕明之后,逐渐否定了探讨文学创作技巧的必要性。见《中国文学研究》3(1995):44-51。
- ⑤ 以上几篇序参见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附录·序跋第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 [Fan, Wenlan. *Annotations to Wen Xin Diao Long*.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8.]
- 黄霖:《文心雕龙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 [Huang, Lin. *Collected Annotations to Wen Xin Diao Long*.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5.]
- 宋濂:《宋学士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 [Song, Lian. *Collected Works of Scholar Song*. Beijing:

-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5.]
- :《浦阳人物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 [---. *Biographies of People from Puya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5.]
- 谭浚:“言文”,《历代文话》第3册,王水照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 [Tan, Jun. “Yan Wen.” *Remarks on Literary Prose across Dynasties*. Vol. 3. Ed. Wang Shuizhao.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7.]
- 王文禄:“文脉”,《历代文话》第2册,王水照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 [Wang, Wenlu. “Wen Mai.” *Remarks on Literary Prose across Dynasties*. Vol. 2. Ed. Wang Shuizhao.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7.]
- 吴承学:“中国文章学成立与古文之学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12(2012):138-56。
- [Wu, Chengxue. “The Emergence of the Study on Texts and the Rise of the Study of Classical-Style Prose in China.”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2(2012):138-56.]
-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 [Yang, Bojun. *Annotations to Chun Qiu Zuo Zhu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9.]
- 杨慎:《杨升庵丛书》,王文才、万光治主编。成都:天地出版社,2002年。
- [Yang, Shen. “On Literary Prose.” *Yang Sheng'an Book Series*. Eds. Wang Wencai and Wan Guangzhi, Chengdu: Tiandi Publishing House, 2002.]
- :《墨池琐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 [---. *Notes from Ink Pool*.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1.]
- 姚福:“青溪暇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0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
- [Yao, Fu. “Idle Words from Blue Brook.” *Indexed Four Branches Book Series*. Masters. Vol. 109. Ji'nan: Qilu Books Press, 1997.]
- 永瑤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 [Yong, Rong, et al. *Catalogued Complete Library from the Four Treasuri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3.]
- 朱荃宰:“文通”,《历代文话》第3册,王水照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 [Zhu, Quanzai. “A General Survey of Literary Prose (Wen Tong).” *Remarks on Literary Prose across Dynasties*. Vol. 3. Ed. Wang Shuizhao.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7.]

(责任编辑:查正贤)